

當認同遇到隱喻： 談隱喻在認同塑造的運作

張玉佩*

《摘要》

近年來，認同與語言符號之間的關係愈來愈受到矚目，認同被視為內在於再現系統中，是透過語言互動所產生的象徵實體。本文即是依循著此脈絡，以1998年柯林頓發表的「新三不政策」所引起的認同風波為例，討論認同塑造之語言機制的隱喻運作。

研究結果發現，同一個隱喻概念系統下之載具，會發生相互串連的現象，進一步建構共享的符號真實，並產生布希亞所說的符號內爆現象。除此之外，隱喻是最簡單直接、不須予以合理解釋論述的方式，讓人們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藉由想像性的連接，將自己過往的經驗賦予在新的事物狀態之上；在這個賦予的過程中，主體的認同位置隨著共同文化背景加以定泊。語言運作之其他切點，如敘事結構與閱聽人之文化養成等，亦共同參與影響認同位置的形塑，這些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繼續探討的方向。

關鍵詞：認同、隱喻、語言機制、符號系統

投稿日期：1999年7月6日；通過日期：2000年3月29日

* 本文作者張玉佩現為政治大學新聞系博士候選人。E-mail: minhsien@pagic.net

爲什麼平白無故「認同」(identity)會遇到「隱喻」(metaphor)呢?

對於這個歷程的發生,可必須話說從頭;一切的問題,都是從好奇與疑惑開始,我剛開始只是對於認同的議題有點興趣,隨著T. H. Eriksen、E. J. Hobsbawn與Benedict Anderson等在討論民族認同的脈絡,語言問題逐漸浮現出來。

Eriksen說道:劃分族群的首要面向在於系統性的區分圈內人與圈外人。(1)

沒錯,認同的建立,當然必須先確定我族與他者。

Hobsbawn也說:族群或民族認同的最重要功能,是用來判定哪些人是無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者。(2)

經由我族與他者之間的區分,確實可以團結民族意識、塑造共抵外辱的情操。然而,提出民族認同是「想像社群」概念的Benedict Anderson開始讓語言在認同問題中插上一腳,他曾說:

認同過程中,連結單獨個體、提升共同點與壓抑差異點的工具,即是語言。(3)

這邊所謂的語言,應該是指整個象徵符號系統,S. Hall在一篇〈誰需要認同?〉的文章中,曾經提出認同問題,其實是我們如何再現自己的問題。

S. Hall說:事實上,認同問題關注的焦點在於我們在歷史、語言與文化資源中的「形成過程」,而不是我們所具有的歷史、語言與文化是什麼;也就是說,不是「我們是誰」或「我們來自哪裡」等問題,而是我們如何養成、我們如何被再現出來,以及這些背景在我們再現自己的過程中所佔據的份量。因此,認同不是外在於再現系統(representation),而是在於再現系統之內。(4)

Hall所說的「再現系統」,就是象徵符號系統,也就是我所說的語言。這類將認同形成與語言系統連接在一起的聲音,在近幾年來愈來愈多,對於民族認同問題的討論,不再是針對人們的種族血緣、生長歷史、地緣位置等本質性的討論,討論的焦點轉移到人們是如何透過語言系統形成認同。

Karen A. Ceralo說道:認同是透過語言互動(linguistic exchange)與社會實踐(social performance)不斷協商而成。(5)

Richard Alba則說:種族是符號的實體(symbolic entity),其對於種族文化符號的重視,更勝於對文化本身的重視。而這種符號性的種族更能因應多變的社會情境

與社會需求。(6)

Kathryn Woodward進一步說：認同的建立可以透過符號系統與社會性歷程標示出來。在符號系統內，可以瞭解社會關係與實踐，尤其是可以看出「哪些人被排除，而哪些人被包含」。…認同是由於差異性而產生，而差異性又是透過符號系統和社會規範所形成。符號系統和社會規範就形成一套「分類系統」(classificatory systems)，用以區分團體和社會的特徵。…我們在社會情境中的主體性，是由語言和文化賦予我們自身經驗的意義，使我們對事物採取某種認同。(7)

然而，對於比較關心語言或說符號再現系統的我，在同意上述學者提出「語言在認同形塑過程中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的觀點之後，其實更想要知道的問題是：「然後呢？」語言到底發生什麼作用？如何發生作用？也就是說，我想要瞭解的是更進一步、更細微地語言在認同形塑之中的運作機制。這種疑問，剛好碰到柯林頓發表「新三不政策」(8)引起軒然大波的台灣認同爭論，我一邊收集這些資料，一邊思索認同的語言問題，然後，「隱喻」就很自然而然地從這些資料中浮現上來，因此也就出現了這篇「當認同遇到隱喻」的巧遇。

壹、前言

1978年美國宣佈與中共建交，台灣舉國共憤，次年侯德建創作的《龍的傳人》(9)一曲成爲紅極一時的愛國主義與民族精神之代表，在社會氛圍的簇擁塑造之下，《龍的傳人》成爲一個家喻戶曉的隱喻，人人以龍的傳人自居，藉由隱喻中的傳統中華民族象徵（如黑眼睛黑頭髮黃皮膚）以及代表民族命脈的中國地理名詞（如長江黃河）等，形成一種集體認同「我族想像」，將分裂的台灣人民編織進中國認同的想像之中。

這是一個相當鮮明的例子，當認同問題遇到隱喻時，深層抽象的身分認同可以藉由實際經驗熟知之隱喻或創造較貼近日常生活之隱喻而加以落實，使得人們可以超越彼此的年齡、性別、階級、職業或理念等特質差別，而形成相互一體的認同感。一般對於語言與認同的研究多半都曾提出，語言可使各自獨立的個體得以溝通、進而形成共享的態度與觀念，連成一體，形成彼此的認同；而我則是想要進一步指出，語言活動中的隱喻在集體認同的形成過程當中，扮演起提供想像、跨越彼此障礙的重要工具。

近年來台灣的認同問題，一直受到各界熱烈的討論，1998年6月美國總統柯林頓

訪問中國大陸發表「新三不政策」在臺灣更是掀起認同爭論風波，表面上看起來是一種「刺激」（新三不政策的宣佈）引起的「反應」（認同爭論），但是若進一步地分析，將可發現，這起認同爭論的風波絕對不是短期間政治變遷所引起的，柯林頓三不政策的宣佈僅是一只導火線，引燃深層潛藏於台灣政治社會脈動下的認同隱憂。

然而，台灣的國家認同問題，並不是依賴單方面的人民意識或血緣種族所認定之結果，它必定受制於在當前國際環境與歷史文化壓力之下、集體產生的作用。⁽¹⁰⁾

「新三不政策」挑起的台灣認同問題，直接反映在台灣的媒體報導上，各家報社透過各自的評論分析，顯現出不同的認同途徑與方向；在這之中，語言成爲一種重要的工具，台灣的認同生態存在於族群並立、文化歸屬歧異並且領土主權範圍曖昧⁽¹¹⁾之間，製造認同的各個隱喻在意識形態的運用之下，隱藏了某些差異，創造出一個聯合的幻相，使得原本互不相識的人們，經由使用相同的隱喻而醞釀出一種休戚與共的「我族想像」，⁽¹²⁾並且指出非我族類、甚至是敵對的他者。

我即是想藉由新三不政策所引起的台灣國家認同之討論風波，進一步瞭解在認同的塑造時，隱喻如何發揮功能？如何區分出我們／他們？如何跨越差異、凝結我族一體的共同想像？如何認知社會環境、形塑認同位置？也就是說，希望藉由新三不政策所造成的風波，來進一步討論當認同問題遇到隱喻時，會迸出什麼樣的火花？

貳、認同與隱喻

根據對於認同的定義，可以粗略地將認同研究分爲二類，一類的認同意義是表示贊同或同意；另一類的認同是指確認或歸屬。⁽¹³⁾

第一類的認同研究，將認同視爲是表示贊同（approval）或同意（agreement），也就是指一個主體的某個意見與另一個主體的某一意見相同或表現吻合，比如說：「我十分認同您這個想法」或「我很認同他的這種行爲」。以《新聞學研究》五十六期的「傳播與認同」專輯爲例，蔡琰的〈消音的傳奇—電視古裝劇價值認同的啓示〉中，所謂的價值認同，即是同意古裝劇表現出的價值觀；而周倩漪的〈從王菲到菲迷—流行音樂偶像劇崇拜中性別主體的搏成〉，⁽¹⁴⁾所謂認同王菲的菲迷，也是指喜歡、贊同王菲表現的歌迷。這一類的認同研究，研究的對象多半屬於價值意識的判斷。

第二類認同研究，將認同定義爲確認（identification）或歸屬（belongingness），確認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的特徵，從而知道自己與他物之不同，

肯定自己的個體性；而歸屬則是指一個存在物經由辨識自己與他物之共同特徵，從而知道自己的同類何在，肯定自己的群體性。關於集體認同的討論，多半是在這類定義之下，例如朱全斌的〈由年齡、族群等變項看台灣民眾的國家及文化認同〉或是林福岳的〈社區媒介定位的再思考：從社區媒介的社區認同功能論談起〉⁽¹⁵⁾等。

一般來說，我們在討論國家認同、文化認同或性別認同時，都是採取第二種定義，本文亦是，即討論一個主體如何確認自己在時間空間上的存在，這種自我認識的過程，不只是牽涉到自我對於自己的主觀瞭解，也包含著相對他人對此一主體存在樣態的認識。這裡牽涉到一個重要的概念，就是他者的存在。

一、認同

人們出自於安全感與一體感的需求，對一個或多個集體產生認同。因此，每一個認同的產生，伴隨著必然的心理壓力，一方面要將自己與不屬於同一種認同的人加以區隔；一方面又必須找尋出認同群體的特質。在這個過程當中，原本用來滿足人們安定感的集體認同之標誌與符號，便成為人們區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工具。⁽¹⁶⁾

與他者之間的區別，成為集體認同形成時的重要過程。T. H. Eriksen曾經說到，劃分族群的首要面向在於系統性地區分圈內人與圈外人，也就是我們與他們，這種區分使得族群得以存在，並標明彼此之間的特色。這種經由族群團體長期表現出的文化特徵，稱為「族群刻板印象」(ethnic stereotypes)，這裡所稱的刻板印象並不帶有輕蔑的意味，而該族群團體內的所有成員也不一定都具有這樣的特徵，但是至少社會對於此團體的成員有符合族群刻板印象的角色期待。這種未必符合真實的族群刻板印象，具有幾種功能：第一，幫助人們有秩序地瞭解社會；第二，合理化社會資源的分配；第三，刻板印象成為定義自己所屬團體的重要因素，它可以標示出自己團體的優點，合理化宣稱「我是甲團體而非乙團體」(如我是台灣人，不是中國人)等。⁽¹⁷⁾

區分我們/他們之間的界限劃分，除了幫助人們歸屬自己所屬的族群團體之外，尚且團結我族意識、塑造共抵外侮的情操，E. J. Hobsbawm對此有精彩的描寫，他說：

在後共產主義的社會中，族群或民族認同的最重要功能，是用來判定哪些人是無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者，這些罪魁者必須為「我們」現今的苦難負責，因為共黨政權已經垮台不見，再也不能拿它當代罪羔羊。……「我們」痛苦委屈、充滿不安、不知未來的方向何在，這些都是「他們」造成的，「他們」必須要為「我們」今天的苦難負起全責。那麼，「他們」是誰？顯然的，「他們」就是「非我族類」的人，是那些

外來的陌生客，因為他們是外人，於是也就成為我們的敵人（Hobsbawm, 1997: 233）。

因此，族群認同經常基於對比的基礎上，如果所有人類都屬於同一種族群體，則無須「族群」這一術語，種族、人種和民族特徵建立在對比、否定的機制；也就是說，族群認同的產生必定發生於區分、對比的前提。⁽¹⁸⁾

此種區分他者與我族的作用，使得集體認同存在著必然的內在衝突。集體認同是人類超越自我的機制，由於包容的對象廣泛，使得自我在被集體認同佔有之後，會逐漸疏離了原本的自我，進而以集體的名義從事對外的行為。然而，集體認同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必然會面臨如何處理集體邊界的兩難情境：是要純化集體內的共同性，排除邊緣的人士及團體；抑或不斷放寬邊界，以納入更多處於邊界之人士及團體？這二種方向無論何者，均會為集體帶來高度的焦慮與不安；因為如果採取前者，不斷純化集體符號，將會讓成員時時感到認同的壓力，並因和集體外的人劃清界線而益加孤立；若採取後者，放寬界限，包容更多的邊緣集體，又會讓集體認同日益模糊，威脅集體認同的核心主張。核心團體的成員必須不斷在純化與寬鬆之間做選擇，選擇純化將塑造更多的敵視團體，選擇寬鬆則會淡化基礎認同的標的。⁽¹⁹⁾

然而，認同的劃分，是基於什麼樣的基礎呢？

對於認同本質的討論，可以分為二個派別，強調認同是基於固定不變的確實基礎者，稱為本質論者；強調認同的基礎是流動與多元者，稱為非本質論者。⁽²⁰⁾ 本質論者認為認同產生基於明顯的特徵，為團體內成員所共享，例如基於客觀血緣連帶或主觀認定的族裔身分而對特定族群產生一體感之族群認同（如猶太人）、共享相同的歷史傳統、習俗規範與集體記憶而形成之文化認同（如中國、埃及），或者是肯定特定社會政治經濟體制而產生之政治認同（如美國、加拿大），⁽²¹⁾基本上都偏向於本質論者的角色，視認同的產生有一明確的基礎。

非本質論者認為，認同的組成是含混複雜的，並不存在著一成不變的共同特徵，同一認同團體內也因個別的成員而存在差異，一體性的形成是起於壓抑成員間的差異點而彰顯共同的特徵。粗淺地來說，認同即是在個體的差異點中找尋相同點，並擴大相同點的特徵而形成集體認同，本質論者強調的是相同點，而非本質論者更加強調這種相同點是壓抑個別成員之間的差異所構成，這種壓抑與形塑共同特質是受到社會環境與意識形態所左右。

無論如何，連結單獨個體、提升共同點、壓抑差異點的工具，即是語言。

Anderson在討論民族形成的原因時認為，構成民族認同或國家認同都是基於一種想像的關係，雖然我們不認識團體內的每一個成員，但是卻想像彼此之間具有某種相同的意念或一體性，他稱這種民族認同的關係為「想像社群」(imagined communities)。在當今大眾媒體發達的社會裡，媒體更扮演了這種傳達「想像關係」的重任，藉由媒體的中介，一群本來空間上分離的個體，卻因此可以在想像的層次上發生互動，他們雖身處於不同的地域或城市，卻因為共同看一份報紙，共同閱讀一本小說，或是共同參與同一個事件的討論，進而產生時間上的共時性，形成一種新的、以媒介為外圍疆界的想像社群。(22) 尤其現代化和都市化的過程削弱家庭、職業以及地方這些特定形式的歸屬感，同時又加強更抽象的歸屬感，比如種族或國家的認同感，而這些必須透過大眾媒介產生連結，如報紙、廣播、戲劇等。(23)

因此，連結人們的大眾媒介所使用的語言，對當代社會認同的塑造，佔有相當的意義；語言具有命名、劃分範疇的作用，使得散佈在世界的各種事物得以組織、賦予意義。區分我族/他者，基本上也是一種範疇的劃分方式，範疇的界限可以根據人們的目的而伸展擴張，(24) 有如認同的界限，可以藉由純化集體符號而縮小範圍，也可以經由模糊界限而容納更多邊界人士。

幾乎所有討論認同形成的學者，如B. Anderson、S. Hall、K. A. Cerulo、R. Alba、K. Woodward等人，都曾經提到語言對於認同形成的重要性，在這邊，我想要更進一步瞭解在這個形成的過程中，語言是如何發揮劃分彼此、確定邊界、鞏固核心概念？我們特別想要提出的是，隱喻，作為一種語言運作的重要機制，在塑造認同的過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它使得抽象的認同層次得以落實到實際生活想像。在繼續探討隱喻作為認同形成的機制之前，我想要先對隱喻的相關概念進行討論。

二、隱喻

早期對於隱喻的看法，將隱喻視為語言花俏的裝飾物之一，(25) 是一種詭辯的形式；但是近代學者發現(26) 人們生活在社會中，不可能站在世界的外面來知覺或詮釋真實，我們只能透過描述真實的語言來瞭解真實，也就是說，真實是透過我們所使用的符號建立出來的；而隱喻，是使用符號瞭解真實的基本方式之一，我們選擇去描述真實的語言，即是隱喻的運作。

隱喻，是指用某種事物來指稱另一種事物，以另一種事物的角度來瞭解和經驗某事物，典型的隱喻形式是「A就是B」，A即是我們想要瞭解的事物，稱之為主體(tenor)，而B則是我們使用來瞭解主體的工具，稱之為載具(vehicle)，例如「我

的室友是頭豬」，即是用「豬」來指稱「我的室友」，我們想要瞭解的對象是主體——我的室友，而豬則是載具，透過主體與載具的並列，建立了他們之間原本不存在的連結與意義轉移。

人們在接觸一項新的陌生事物時，經常使用過去熟悉的經驗或概念來進行詮釋，這種思考的模式本質上就是隱喻運作的程序。隱喻的作用便是人們透過對於載具的熟悉，而將感覺傳遞到主體，這種以一種事物來瞭解另一種物的方式，基本上是隱藏某些它們相異的特質，讓我們集中注意力到隱喻相關的角度，而忽略與隱喻不相關的面向，例如「論辯像是戰爭一樣」，強調論辯敵對特質，而忽略合作的面向。所以，隱喻是部份相關的，而不是全部等同；若是全部等同的話，那麼A就是B，而不須說A像是B。(27)

因此，隱喻可以說是主體與載具之間找尋相似性，而找尋的方式，可能有二。一種是主體與載具之間原本就存在著某些類似的東西，可以轉供比較或比擬，甚至進一步將載具的其他特性轉移到主體，例如說「琳達瘦得像根竹竿」，琳達的身材即是與竹竿之間都共同有「又瘦又長」的特性。

另一種方式，即是在主體與載具之間「創造」相似性，這種情況特別是發生在對於新事物的命名上。William Ausmus A.研究「核冬天」(nuclear winter)⁽²⁸⁾ 隱喻的發明與沿用時，指出Carl Sagan發提出核冬天的隱喻是為描述一個複雜、完整的新的現象，因為人們的愚蠢行為所引發的核戰後世界；在這裡，核冬天的隱喻是一種「舊詞新意」(catachresis)，也就是「為了彌補文字的縫隙所創造出來的辭彙，目的在產生一些新的感覺，把這種新的感覺注入到舊的字彙當中。」(Ausmus, 1998: 69) 科學家們研究出來的資料，將「新意」注入「核」與「冬天」二個舊字彙中，並且藉由這些因素的互動創造了隱喻。

此外，隱喻的構造中，除了主體與載具的存在以外，主體與載具之間互動的關係，也是構成隱喻意義的重要關鍵，Robert L. Ivie曾經提出隱喻最重要的使用方式，就是將載具的意義領域轉移到主體身上，使載具與主體之間的互動到達一種新的意義層次，而這個意義的層次需要二者共同參與、互動而成，主體逐漸認同載具的想像，進而進入一種二者的相似；在這個過程中，載具以及相關系統構成我們對於主體的視野，就像是濾鏡決定看得到的分子、模型決定最終的形式。而載具必須存在於眾人皆知、慣性熟知的概念系統中，一旦人們對於載具的意義模糊不清，這個隱喻就無法發揮它的功能、創造一個新的意義層次。⁽²⁹⁾ 以Carl Sagan的核冬天為例，由於載具「冬天」給予人們確實的感知經驗，讓人們獲得感同身受的感覺，使世界進入一個想

像的空間，並最終讓抽象概念能夠幾乎等同於物質感受。

然而，在隱喻的運作過程，意義是被建構出來的，主體與載具之間的連結不一定存在著理性的邏輯結構，它們經常僅僅只存在著表面關連，但卻因為隱喻的連結而使得相關的態度與價值觀得到轉移。Steven Perry在探討希特勒對於猶太人的「寄生主義」(parasitism) 隱喻時⁽³⁰⁾ 提出，希特勒將猶太人的地位視為文化次等品，並不是藉由隱喻來「說明」這樣的概念，而是經由隱喻來「建構」猶太人的形象。「猶太人成為文化次級品」這個宣稱，並不是以正式的邏輯推衍或真實事物來加以論辯說明，而只從希特勒對「寄生主義」之想像闡述而來；這個隱喻並不隸屬於希特勒的論述之下，它就是希特勒的「論辯」過程或證據。希特勒的寄生主義隱喻，雖然源自於種族情結，與理性邏輯推理無關，但是跟隨而來的是相關的態度與價值，例如將猶太人當作寄生蟲而加以屠殺。當人們引用這樣的隱喻時，其實就已經從這樣的玻璃窗來看待外面的世界。

此外，隱喻有如語言的其他功能一樣，不僅是源自於人們的思想，更進一步地，它也會刺激思想，建構態度與價值觀。S. Perry⁽³¹⁾ 經由希特勒寄生主義隱喻的分析，詮釋隱喻、思想與行動之間的互動，希特勒想要將猶太人解釋為會危及德國存在的威脅，因此他提出「寄生主義」隱喻，這個隱喻使得猶太人被去人性化，被視為像疾病病毒、內在的寄生蟲、或者是有毒物質，它會慢慢潛入身體進行破壞，而最終對於國家身體造成巨大的浩劫。因此，它成功地將猶太人從無用的但也無害的形象，轉移為對國家的威脅，並且製造出德國民眾需要一個像希特勒一樣的救星，來解救猶太瘟疫的危險。但是，猶太人既然如希特勒所說的、比亞立安人低等，那他們憑什麼對亞立安人產生威脅呢？答案是猶太人之於亞立安人，就像是寄生蟲之於主人一樣，是一個微小的、次級的依賴體，但是終極能促使較高等生物體的毀滅；而且猶太人是屬於本質、自然天成的罪惡。這種去人性化的做法，使得人們可以較容易對猶太人產生敵意，傳統上人與人互動的關係不須實行在猶太人身上，而納粹與猶太人的爭鬥便成為國家身體的拯救活動，消滅猶太人是勢在必行的。

整體而言，我們可以將隱喻的功能運作歸納為下列四點：⁽³²⁾

第一，隱喻選擇性地照亮某些概念：主體與載具的連結時，彰顯與載具相同的特性而隱藏主體其他的特性，也就是說，使得主體的某些特性被特定強調出來，以「我攻破他的論證」、「他的宣稱是沒有防禦性的」為例，即可推論出在該文化中，溝通被視為是爭論的，而不是一種相互分享的過程。因此，批評者可以追蹤這些隱喻的使用，尋找這些意義背後的意義。

第二，隱喻可以生產意義：隱喻可以讓人產生新的觀點。例如一個認為「愛是瘋狂的」（它就是這樣發生的，是我們不能控制的）委託人，聽到他的律師給他的另一個隱喻「愛是勞動」（婚姻是你必須努力加以耕耘的）時，他同時因為勞動隱喻看到瘋狂隱喻沒有呈現出的觀點。在某種程度上，使用隱喻就是承認一種失敗，承認直述語言沒有辦法呈現出的複雜概念與感覺的失敗。

第三，隱喻經常遮蓋某些概念或價值。當一個隱喻越來越普及，成為慣用語句之後，它所隱藏意義就越來越不受到注意，因此，追蹤這些「被遺忘的」意義是需要非常謹慎的。例如老闆將員工視為是像燃料一樣的「資源」時，它同時也遮蓋了員工需要鼓勵的面向。

第四，隱喻具有某些限定繼承物（entailment）。隱喻彰顯某些意義，同時也暗指著某些方向。一個隱喻可能會指出人格特質（一個相信「時間就是金錢」的人）、智識世界觀（愛情就像旅程：「我們的感情是沒有出路的」）、或是文化預設（上下：「我在這個情境的上端」、「他位於這個位階的尾端」）。隱喻會牽連出一系列的政策行動，假如相信「論辯就像戰爭」，同時也隱藏的一些攻擊性的預設：1. 人們本質是競爭的，2. 策略比真理來得重要，3. 短期的勝利是很重要的。當人們對於他們所偏好的隱喻使用越來越不自覺的時候，他們所偏好的隱喻同時也暴露出他們對行動的承諾。

三、當認同遇到隱喻；問題意識之所在

集體認同形成的重要關鍵，在於團體內的人民可以超越彼此個別屬性的藩籬，凸顯某種共同特徵，進而「想像」自己與眾人融合為一體，例如反核團體的組織，參與其中的人士便是超越教育、年齡、性別等個別屬性，因凸顯共同反核的理念而形成集體認同，對外採取抗議、遊行等行動。

在這種超越個人達到一體的過程中，必需使人們能邁向較高抽象階級層次的想像，而其中語言、甚至大眾傳播媒介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這是眾多學者都曾經提到並且同意的觀點。在這邊，我想更進一步的論證，語言在形成「想像社群」認同過程中，隱喻的使用成為一種重要的認知手段，它藉由具象、實際日常生活經驗作為載具，使原本抽象的認同主體得以落實，照亮集體認同的共同特徵，隱藏集體內個別的差異，並且使得對於載具的態度與價值觀得以轉移到主體身上。接下來，我將要以「新三不政策」所引發的認同危機，來進一步討論隱喻在認同塑造時所產生的機制功能。

參、文本選取與研究設計

Woodward曾說：「只有在發生危機時，只有在原本被認為固定、一致、穩固的認同轉變成疑慮變動時，認同才能成爲一個被廣泛關注的議題。」（1997: 15）。

同樣的，我在討論認同的問題時，也預計將研究焦點文本鎖定在台灣最近的認同危機——即是美國新三不政策的影響。

受過日本統治、國民黨殖民與美國文化入侵的台灣社會，在認同的問題上顯得相當複雜，人們所擁有的並非單一的認同，而是一個由許多不同民族與文化屬性所組成的認同體，其中蘊含著個體在建構空間、時間以及觀點時所呈現的差異，個人的國家認同並不一定和其他的文化認同相符合，而這也是一個無法免除中共壓力的政治選擇。⁽³³⁾ 因此，在國家認同的主題上，台灣的定位勢必受到中共、美國以及內在文化意識共同左右。

近年來，由於中國大陸遲遲不肯放棄對台使用武力的宣稱，以及台灣汲汲於擴展國際空間，使得台海關係經常出現緊張的狀態。美國總統柯林頓在訪問大陸之前，台灣社會各界即開始熱切討論柯林頓此行對台海關係可能產生的影響，「新三不政策」的宣佈無疑是引爆台灣深藏的國家認同問題，在媒體上更是引起軒然大波的討論，各家報社在不同的意識形態運作之下，對於當下國際環境產生不同的認知，並且形塑出不同的敵我區分與認同策略；而這波廣泛對於台灣認同定位的討論，正是用來瞭解塑造認同的語言機制的絕佳時機。

因此，我選取了《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對於新三不政策的報導作為分析對象，並且將焦點集中在特稿與分析稿上，雖然每一則新聞事件的報導、切入觀點，都包含著記者、編輯等守門人的選擇，但其中的特稿或分析稿，更是清楚地顯現出報社對於整個大環境的觀察，凸顯出他們所關心、認同的台灣形象。因此，在每報均有數百篇的相關報導之下，本研究選擇以特稿或分析稿為主要關注焦點，而將其他報導視為背景資料的參考。

此外，為了將研究焦點鎖定在台灣國家認同上，我在選取文本時，以直接討論台灣立場的特稿為主，不直接牽涉到台灣認同立場的討論，則予以捨棄，僅做參考。例如1998.6.23《聯合報》二版的新聞眼，評論美方將關第二管道作為溝通中美台三邊關係，因為沒有直接涉及台灣認同問題，因此沒有納入分析範圍；再如1998.7.4《聯

合報》的焦點評論，因為主要分析中共與美國之間的關係，亦無沒有直接涉及台灣認同問題，亦沒有納入分析範圍。

經過初步的收集、篩選與整理，本研究在1998年6月23日到7月7日間，於三家報紙共收集五十篇特稿與分析稿，各家報紙的數量為：

1. 聯合報：19篇，除了直接標明特稿者外，尚且包括社論、〈黑白集〉（短評）、新聞分析、新聞眼、觀察站等不同形式的分析稿。
2. 自由時報：13篇，包括特稿、〈自由談〉（短評）、社論、〈探針〉（新聞分析）、新聞透視、新聞幕後等專欄。
3. 中國時報：18篇，包括特稿、〈華府瞭望〉（特派記者的分析）、新聞幕後、社論、看問題等專欄。

在文本的實際分析程序，我則是參考Ivie⁽³⁴⁾與Foss⁽³⁵⁾分別提出的隱喻分析五個階段，以及Hart⁽³⁶⁾提出的三個隱喻分析的探針。Ivie提出隱喻的五個分析步驟分別為：

1. 對於文本進行通盤的瞭解：熟悉文本以及文本產生的脈絡，是詮釋任何論述的基本動作。研究者應當在進入特殊分析之前，對文本進行通盤的瞭解，包括文本外的其他論述、反對派人士的說法、觀眾的反應等。
2. 從相關閱讀文章中，選出代表性的文本，並且標明演說者所使用的載具。將標明出的載具加以分類歸檔，並且註明其所屬的立即情境。
3. 依據載具所屬的「限定繼承物」(entailment)，加以區分為幾個次團體，每一個群集都暫時假定有一個「隱喻概念」，而所有的群集即代表「隱喻概念的系統」。
4. 將每一個載具都歸類到群集當中，並依據載具所呈現出來的概念，進一步詮釋。
5. 整體的解釋言說者的「隱喻概念系統」。

Foss提出的五個步驟基本上與Ivie的步驟相去不遠。Hart則是提出隱喻分析進行時的三個探針：

1. 文本中存在著什麼樣的隱喻系統？
2. 他們彼此之間是否一致？
3. 他們所累積出來的效果為何？

根據上述學者的建議，我預計將本研究的進行步驟規劃如下：

第一，對於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事件，做全盤的觀察與瞭解。也就是說，將研究焦

點放在台灣的國家認同上，觀察這一段時間以來對於台灣認同定位的討論，試圖初步瞭解各家報社對於該事件的認知、態度與立場。

第二，進行隱喻分析，首先抽取出使用隱喻的部份，加以群集分類，分別找出主體、載具與其互動所產生出的意義脈絡以及衍生的相關態度和價值觀。並且藉由分析，試圖瞭解隱喻如何在集體認同的塑造發揮作用。

肆、隱喻在認同塑造過程的運作

建構集體認同的首要面向，在於區分我族與他者，藉由象徵性的儀式或符號系統來凸顯集體內我族的相同點以及與他者的相異；在認同的形成過程中，語言佔有相當重要的位置，抽象性的認同感經由語言符號來加以落實，人們經由語言來劃分範疇，根據這個範疇來瞭解世界，並且往往認為這些範疇是實際存在的，如將台灣人劃分為外省人、本省人、客家人或原住民等，而根據這些劃分來瞭解族群內部的成員。⁽³⁷⁾這種劃分範疇的方式，成為人們認識社會的基本結構，改變範疇概念本身，就是改變我們對世界的認識。⁽³⁸⁾

然而在進行我族想像、他者區分與範疇界限劃分的過程中，隱喻的運用使得抽象的概念得以落實到日常生活經驗當中，激發集體認同的情感。為了提供隱喻分析深度的資本資料，我想先對三家報紙對於認同塑造所使用的環境認知、自我（指台灣）定位的背景進行初步瞭解。也就是在研究步驟的第一步中，將對文本所呈現出來的事件，進行通盤脈絡的瞭解。

一、文本呈現出的事件脈絡與瞭解

綜觀三家報社對於此次事件的觀察，可以歸結出在美國、中共與台灣的三方角力中，美國總統柯林頓親自前往中國大陸進行訪談，代表美國向中共傾斜，整體國際環境對台灣是不利的發展，然而，對於這種不利環境的觀察與解釋，三家報社分析評論表現出不同的強度反應，我初步將這些反應歸結如下：

表一：三家報紙對於國際環境的危機感整理表

	對國際環境的危機感	情感反應	未來的因應之道
聯合報	強	感到無力、無奈與焦慮	促進大陸民主改革，加強與大陸交流。
自由時報	弱	認為台灣有「理」有「力」，可大步走遍天下	應堅立自己的信心，強化自己民主與經貿的優勢。
中國時報	強	認為台灣是被擺弄的棋子	務實際解大陸情況，與大陸展開全面性交流。

具有強烈威脅感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將中共描述為勢力逐漸興起的國家，冷戰結束之後，美國迫於國際現勢的需要，必須向中共靠攏，台灣成為美國與中共相互制衡的工具，台灣在二邊相互拉扯之下，並沒有自我決定的權力，我們可以來看看下列的描述：

台北未來所要面臨或克服的問題……是一個大致已經逐漸定型的國際政治體系；特別是在經歷南亞核試與亞洲金融風暴之後，中共在國際體系實力已經強化。（《聯合報》，1998.6.25，三版）

中國大陸是一個日益興起的力量，沒有它的參與及合作，世界的和平與秩序就無法維持，所以不能不與它建立「建設性的戰略夥伴關係」。（《聯合報》，1998.6.27，二版）

儘管美國與中共的政治制度差異極大，對人權基本價值的看法南轅北轍，但雙方的「戰略夥伴關係」將因國際現勢而繼續增進。（《聯合報》，1998.7.4，二版）

儘管我方一再強調台灣與美國有共同的價值觀及民主理念，但這都不能改變美國在眾多國際事務上，需要中共配合的事實。台灣的道德呼喚能發揮多少效用，誰也不敢保證。（《中國時報》，1998.6.25，二版）

政治現實不改變的話，台灣與中共在國際舞台一較長短的劣勢現狀也將繼續。
(《中國時報》，1998.6.27，二版)

在面對美國與中共關係逐漸親密、中共漸「強」、台灣趨「弱」的環境之下，
《聯合報》則是提出台灣應當仿效柯林頓，與中共展開往來：

不要因為台獨路線與十二億人為敵，而應仿效柯林頓總統，用心與全體大陸人民
對話，以促進中國大陸的「和平演變」(《聯合報》，1998.6.30，二版)。

住在台灣的人，沒有人會欣賞共產黨，沒有人願意過受管制的日子。但是若跟大
陸鬧翻了，會吃眼前虧。我們要設法與它「和平共存」，別動刀動槍；同時彼此在交
往中相互發生影響，促使他們的「改革開放」走得更快；有朝一日，兩岸各種差距都
縮小了，統一也許就有可能。(《聯合報》，1998.6.27，二版)

《中國時報》則是建議台灣當局應看清國際現勢，瞭解台灣在國際環境中的定
位：

台北在思考柯江會對台灣問題的觀點，就不能僅僅由兩岸關係來分析，而必須由
美中(共)雙邊在國際局勢下的大戰略布局來加以分析，考察其各自利益與合作必要
性，始能瞭解「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如何結構而成，則台灣問題在總體架構下的定
位、政策與發展方向，即可明確浮顯而出。(《中國時報》，1998.6.28，三版)

相對於《聯合報》與《中國時報》對於大環境感到的強烈危機感，《自由時報》
雖然也意識到未來的國際關係對台灣不利，但其所表現的環境危機感並不如前二報那
麼強烈：

就美國利用柯江會談開啓的全球戰略架構而言，美中戰略夥伴關係明顯已超越台
灣的戰略價值，形成美中台三角關係向中國傾斜。(《自由時報》，1998.6.29，二
版)

《自由時報》反過來強調台灣本身的優勢以及特有的經貿實力：

後冷戰時期兩大全球戰略架構下，台灣並非沒有躍升的機會，相反的，台灣本身
的經貿力量、民主優勢、多元民意，正是台灣本身的經貿力量的堅實後盾。(《自由
時報》，1998.6.29，二版)。

從上述的分析中，我們可以初步看出三大報紙的立場，基本上《中國時報》與《聯合報》均主張因應國際環境不利的發展，台灣應當儘快開展與中國大陸的往來；而《自由時報》則是認為環境雖然不利，但是台灣實力堅強，應當靠著自己力量闖出天下。在有了這樣的初步認識之後，我們可以進一步討論認同的塑造過程，以及隱喻如何發揮作用。

二、隱喻在認同建構中的運行機制

集體認同的塑造，首先必須回答的是「我是誰？我族內部的成員包含哪些人？我族身處的環境如何？」等問題，也就是確立自我的定位；在確立的過程中，抽象、破碎、難以掌握的自我形象，必須藉由語言來加以定泊，語言成爲自我認同建構的「鏡子」，⁽³⁹⁾藉由這面鏡子的反射，我們才得以看到「我們」的形象，隱喻於此便是介於我們與鏡子之間的「濾鏡」，不同的隱喻濾鏡透露出不同的認同觀點。

首先，我們可以先來看看《聯合報》對於自我的認定：

不管是在大陸的中國人還是在台灣的中國人，內心儘管信仰和贊成民主，心裡大概總不是滋味：快到二十一世紀了，還要外人來教訓我們民主的價值。（《聯合報》，1998.6.30，二版）

所謂的「外人教訓」是指柯林頓在北大演講，大談民主自由等觀念，雖然柯林頓是面對大陸的中國人提倡民主的概念，但是在《聯合報》看來，身處台灣的中國人來說「不是滋味」，因而說：

生活在台灣的中國人，希望對岸國人的人權情況日有漸境。（《聯合報》，1998.6.28，三版）

這裏所顯現出對於未來的行動規劃，也將對岸的中國人包括在內。這種「內」與「外」的隱喻，藉由將柯林頓比喻爲外人，將中國與台灣歸納到「我族」的範圍之內。採取相對立場的《自由時報》，在不同的隱喻之下，看到不同的台灣立場：

對於台灣而言，最大的災難莫過於被中國統一。（《自由時報》，1998.7.2，二版）

台灣人不喜歡中國，這是任何立場的黨派、團體在此地所進行的民調，都可以清楚看出的結論。（《自由時報》，1998.7.7，二版）

在這個隱喻中，主體是中國與台灣的統一，而載具則為災難，主體與載具的連結（即統一與災難的連結），讓人們對於災難的印象，如天崩地裂、民不聊生等，轉移到主體「統一」的形象；更進一步的，將台灣與中國擬人化，讓人們得以用自身的人際經驗如喜歡、討厭等來思索抽象複雜的國際關係，而忽略了國與國之間、或政治體與政治體之間，相互往來的經濟、政治與文化互動等其他因素。

在認同建構的過程中，除了我族／他者的想像之外，我族所身處的國際環境，也呈現出對於我族的態度。在對國際環境具有強烈威脅感的《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報導中，「談判桌上籌碼」、「棋子」與「大象腳下的小草」的隱喻，也可以看出他們對於自我能動力的觀感。首先，我們先來看看「籌碼」的隱喻：

台灣作為「中」美兩大國談判的籌碼，其間充滿無力感及焦慮。（《聯合報》，1998.6.30，二版）

美國與中共的全面交往，有其全球戰略性的考量，台灣問題其實只是眾多議題中的一環，台灣無可奈何的成為雙方在談判桌上的籌碼。（《聯合報》，1998.6.25，三版）

跟隨著隱喻載具「籌碼」相繼而來的概念，包括：1. 談判桌上對峙的二方（中共與美國），才具有實際的決定權；2. 籌碼可以替換為金錢（現實生活中利益），但是並沒有決定自己命運的力量；3. 雙方的輸贏，最終以籌碼作為計算。將台灣視為「籌碼」，除了表現出自身的無力感之外，並已放棄爭取未來的行動力，因為「籌碼」並不會自己主動爭取未來。同樣強調二大強權相爭的隱喻，尚有將台灣比喻為棋子：

在這局對奕中，台灣不僅是觀棋，可能還是局中棋子，政府一再強調「密切關心而不憂慮」的立場，其實透露著深深的被動與無奈。（《聯合報》，1998.6.25，三版）

台灣在這個新的國際形勢中，無疑是扮演了大國間博奕的棋子角色，本身在棋局中的份量，主要不是由自己決定的，而是由棋局決定的。（《中國時報》，1998.7.1，二版）

跟隨著棋局的隱喻而來的，同樣也包括：1. 棋局的行動是由下棋者（中共與美國）所決定的，是雙方鬥智鬥力的結果；2. 棋子前進後退，都是依賴整個棋局的安排，而非單一棋子可以決定的。所以作為棋子的台灣，只能憂心自己的未來而沒有辦

法採取主動權。

此外，「兩象相爭，小草倒楣」的隱喻，卻是凸顯另一種面對未來的無可奈何：

美國及中共是兩頭大象，台灣則是它們身下的小草。兩頭象感情不好，對抗打架，小草必然受殃災；兩頭象感情好，纏綿親熱，小草也是被壓踏。（《中國時報》，1998.6.27，二版）

大象與小草的相對，首先凸顯出的是體型大小、力量強弱的差異；二頭對等的大象（中共與美國）經過擬人化的處理後，二者可能對抗打架，也有可能纏綿親熱，然而位居於下的羸弱小草卻怎麼樣都會受到災殃或踐踏。

經由「籌碼」、「棋子」到「大象小草」的隱喻建構，共同塑造出台灣弱小無力，受制於兩大強權壓迫的自我形象。然而，採取相對立場的《自由時報》，在隱喻的使用上，卻呈現出不同的觀點：

在國際社會上，台灣的處境就像過去的台灣啤酒，雖然在民主、經濟上成就非凡，卻因自卑自憐，缺乏信心，以至於「上青」⁽⁴⁰⁾，卻不敢「大聲」。（《自由時報》，1998.6.29）

台灣啤酒在國際市場上享有聲譽，素質優良向來是國人的驕傲，將台灣比喻為台灣啤酒，除了強調優越感以外，並且與歌手伍佰⁽⁴¹⁾替台灣啤酒拍的廣告印象產生互文性（intertextuality）的指涉連結，伍佰本土的形象以及在搖滾舞台上大聲吶喊歌唱，代表台灣對自己的信心。

此外，在敵我的他者區分上，隱喻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位置。原本模糊不清的敵我劃分，經由簡化、善惡分別的隱喻敘事結構，英雄、小人或惡棍在現實世界中得以落實，小人與惡棍成為理所當然的他者，而好人或善良的人自然也成為我族的投射。

《自由時報》使用的「移情別戀」的隱喻，可以進一步說明具有敘事結構的隱喻運作：

柯林頓親口說出三不，國民黨跳腳，統派跳躍，而最尷尬的，莫過於將台獨列入黨綱的民進黨，在「阿凸仔⁽⁴²⁾情人」向「阿共仔⁽⁴³⁾敵人」投懷送抱，移情別戀之下，失望傷心之情，無以名狀。我本有心向明月，無奈明月照溝渠，國際政治本來就是最現實的，既然郎心似狼……。 （《自由時報》，1998.7.3，二版）

隱喻所要說明的主體，可以視為是台灣面臨的中共與美國靠攏的問題，現實世界

發生的「新三不政策」事件被予以「移情別戀」的故事載具加以詮釋。在這個隱喻的故事結構中，台灣成為無辜受害的被背叛者，原本的美國情人向情敵中共投懷送抱，而柯林頓親口宣佈的動作被視為是背叛行爲。因此，在這個隱喻結構中，可凸顯出台灣是必然的「我族」，而情敵中共與背叛者美國則成為「他者」，中共與美國於此被劃為敵對的另方。下一個例子中，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自由時報》對於美國與中共這二個敵對他者的態度：

美國曾經扮演英雄救美的角色，但這位大英雄現在雖然口中還是念著民主人權，卻強迫民主績優生（指台灣），一定要嫁給惡漢（指中國），不能有二心。而爲了彌補內心的愧疚，也只保證惡漢不會搶婚，不會動粗，卻不管這樣的婚姻是否幸福。（《自由時報》，1998.7.6，二版）

台灣人不喜歡中國……台灣人的「不滿意」，現在卻被美國這個仲介人，以所謂的「三不」，不准台灣成爲單身貴族，強迫與中國成親，而且還詭辯，台灣與中國是兩情相悅，自願結合。……「三不」並非媒妁之言，而是台灣的賣身契，而美國這個仲介人，也並非心存祝福的紅娘，根本就是蓄意出賣台灣的老鴿了。（《自由時報》，1998.7.7，二版）

惡漢搶親的隱喻，加諸在美、中、台三者的關係上，凸顯出台灣對於美國與中共狼狽爲奸、私自決定台灣前途的反抗。美國總統宣佈新三不政策，強迫台灣不得獨立、應積極與大陸產生交流的行爲，就像是拉皮條的老鴿一樣，強迫黃花閨女／民主的績優生／台灣下嫁給張牙舞爪的惡漢。整個敘事結構可以代換爲：

表二：惡漢搶親的隱喻敘事結構

	主 體	載 具
行 動 者	台灣	黃花閨女
	中共	惡漢
	美國	老鴿
行 動	新三不政策	賣身契
	中共統一台灣	惡漢搶親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主體與載具二者之間經由隱喻產生的連結互動，惡漢與老鴇當然是非我族類的他者，善良主角也理所當然的成為我族的化身，當人們接受這個隱喻的連結時，同時也接受隱喻中的我族與他者的劃分。然而，這個故事尚未吐露出來的弦外之音：傳統故事的結果必然是「邪不勝正」，惡漢與老鴇最後必會受到處罰，被迫害的黃花閨女也會奮起掙扎而找到自我的方向。這種充滿原動力的隱喻，與《中國時報》、《聯合報》所使用的「籌碼」、「棋子」，大不相同。

此外，在這次的分析中，我們也發現，隱喻不僅可以協助區分我族與他者的區別，它尚可藉由標示我族中的歧異，進而純化集體認同的界限，我們可以來看看下面〈罵秦檜〉的隱喻：

〈罵秦檜〉柯林頓…說出對台三不之後，台灣內部竟出現「秦檜式」投降主義，二千一百八十多萬人應該一起鳴鼓攻之。…「三不」也發生了「照妖鏡」的效應，使一些政治人物及媒體的狐狸尾巴不由得露了出來。…「統一公投憲典」…是「心中有中國，眼中無台灣」的產物。南宋時代，投降主義者秦檜曾提出「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等等以投降換和平的思考方向，並把抗金主將岳飛害死在風波亭。於今，台灣秦檜式投降主義又出現了。我們必須提高警覺，並揭穿其真面目。（《自由時報》，1998.7.5，二版）

岳飛精忠報國的故事，曾出現在小學國文課本之中，為國人耳熟能詳。將這個故事結構與當前發生的事件連結，將主張與大陸交流、進而統一的人士，比喻為賣國賊秦劊；一旦同意隱喻中的主體與載具的連結，也就等於同意將統派人士視為賣國賊，因而應將之排除於我族之外。

伍、結語

經由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將《中國時報》、《聯合報》與《自由時報》三家報紙在「新三不政策」認同風波之討論，分為二個隱喻概念系統的範疇：第一個隱喻概念系統，包括「籌碼」、「棋局與棋子」、「大象與小草」等隱喻，凸顯台灣孤立柔弱、無力對抗世界局勢的形象，《中國時報》與《聯合報》的言論多半屬於此類範疇；第二個隱喻概念系統，則包括「統一災難」、「台灣啤酒」、「移情別戀」、「惡漢搶親」等隱喻，強調台灣優質民主、經貿強健、中美雙方背叛的形象，《自由時報》之論述多屬此類。

以Ernet G. Borman符號輻合理論⁽⁴⁴⁾ (symbol convergence theory) 的術語觀點來看，此二類隱喻概念系統，皆個別出現符號輻合的「覆頌串連」(chain out) 現象，進而建構出各自的「語藝視野」(rhetoric vision)。

從第一個隱喻系統概念來看，《聯合報》1998年6月25日在同一個版面(三版)同時出現「籌碼」與「棋局」的隱喻後，1998年6月30日《聯合報》於二版再一次覆頌「籌碼」隱喻，1998年7月1日則由《中國時報》於二版覆頌「棋局」隱喻，經由這種不斷覆頌與串連，進而製造出隱喻載具(籌碼與棋子)所賦予主體(台灣)的氛圍，台灣的認同位置因此被放置在四面楚歌、孤立無援的狀況，未來命運不能操之在我，須依附世界環境、中美關係的發展而定，呈現出宿命論的論點。不管這種覆頌串連是故意或巧合，這些運作的確產生創造語藝視野的作用；再者語言機制產生作用之處，本來就是在於人們無法察覺的意識之外。

同樣的隱喻串連現象，也出現在第二個隱喻概念系統之中。《自由時報》首次在1998年7月3日二版自由談〈不怕阿凸仔變心〉一文中，將美國比擬為背叛的情人，將中共視為情敵，以三角關係指稱美中台；1998年7月6日稍加變更，提出惡漢搶親的隱喻；1998年7月7日更是直指美國是逼婚的老鴛、而「三不政策」則是台灣的賣身契。相對於第一個隱喻概念系統，這個系統所呈現出來的是自力更生、自信滿滿，且充滿民族主義色彩的論點，相形而來的是自我能動力的促進，促進台灣主動積極爭取未來命運。

從這二個隱喻概念系統中的串連現象中，可以發現在同一個系統之下，經常會發生載具串連的情形，這種作用類似布希亞(Jean Baudrillard)提出的符號內爆(implosion)，載具彼此相互指涉、內爆出超乎真實的意義。這一部份，本文雖無力進一步討論，但是在現今後現代符號滿天飛舞的世界裡，隱喻系統內載具與載具間相互串連、內爆意義之現象，確實值得未來作進一步的分析。

此外，我們也可以在隱喻概念系統中，看到敘事結構、文化背景之作用。清朗的敘事結構，黑白分明的二元對立，協助人們清楚辨識敵我位置、區分善惡，特別是結合認同的塑造，我族與他者的關係化身為載具故事中之角色，以「移情別戀」與「惡漢搶親」的隱喻為例，善良無辜的主角自然成為我族的代表，而惡漢與老鴛等惡棍也成為他者的化身，原本複雜的社會關係因此而簡化為善惡分明的故事結構。Ivie(1987)曾經提出隱喻的載具必須是眾人皆知、慣性熟知的概念系統，因為一旦人們對於載具之意義模糊不清時，隱喻就沒有辦法發生功能；這也就是為什麼《自由時報》所使用的傳統中國民間故事之隱喻，特別鮮明的緣故，因為這是你我自小熟知的典

故。因此，隱喻的運作包括文化背景之養成、不是跨時空領域存在。

這邊牽扯到另一個語言的作用—辨識與命名紛亂世界。隱喻使我們藉由具體、世俗的經驗，來瞭解複雜未知的狀況，當人們在面臨紛亂、無所適從的環境時，建構秩序與產製意義的最簡單方法，便是運用過去舊有、熟悉的隱喻概念或結構，來瞭解新的事物，區分敵我，建立關係；一旦人們接受主體與載具的連結，也就同意將載具的運作邏輯與行動方向，運用到現實生活中，採取同樣的態度與行動方針，Ivie（1987）、Hart（1990）提出的隱喻之「限定繼承物」（*entailment*），即是跟隨著隱喻而來的產物。雖然主體與載具的連結並不存在著理性邏輯推演過程，但載具所附加的相關態度、價值觀或行為卻會不自覺地跟隨著載具連結到主體的身上。以「籌碼」與「棋子」的隱喻為例，台灣地位（主體）與籌碼或棋子（載具）之間的連接，並沒有存在任何解釋或理由，這一部份的連結是跳躍性的連結，但是經過這一個跳躍連結，載具籌碼與棋子的價值與行動力卻轉移到主體台灣身上，建構台灣「我族」在國際間的想像位置，並且限制未來行動的可能。

由上述的分析中可以看出，認同位置的定泊是存在於複雜的語言網絡之中。隱喻是最簡單直接、不須予以合理解釋論述的方式，讓人們在不經意的情況下，藉由想像性的連接，將自己過往的經驗賦予在新的事物狀態之上；而在這個賦予的過程中，主體的認同位置隨著共同文化背景也加以定泊。這一連串在隱喻運作下的認同定泊過程，皆可以在「籌碼」、「棋子」等第一隱喻概念系統以及「災難」、「台灣啤酒」、「惡漢搶親」等第二隱喻概念系統之中發現。然而，本文發現，語言運作之其他切點，如內爆之符號意義、內含之敘事結構以及閱聽人之文化養成等，亦共同參與影響認同位置的形塑，這些可以作為未來研究繼續探討的方向。

註 釋

- (1) 這是T. H. Eriksen在1993年提出。
- (2) 參考Hobsbawn, 1997: 233。
- (3) 參考Anderson, 1991: 6-12。
- (4) 引自Hall, 1996: 4。
- (5) 引自Ceralo, 1997: 387-388。
- (6) 參考自Ceralo, 1997: 389。
- (7) Woodward (1997).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 (8) 「新三不政策」是指美國總統柯林頓，於1998年6月30日在中國大陸上海圖書館與當地各界菁英之士座談時，公開宣佈美國對台灣的三不政策，即是不支持台灣獨立，不支持一中一台，不支持台灣加入國家身分的國際組織。
- (9) 關於「龍的傳人」一曲的社會意涵的進一步討論，可參考葉月瑜，1999: 54-59。
- (10) 張茂桂在討論認同問題時，曾經指出深層身份認同的形成，像是國家認同問題，並不是依賴單方面的意識反省、個人的自我改變或個人獨立思考的結果，也不是短期的政治變化就可以改變或形成的；而必須在當代社會關係與歷史壓力中，透過集體互動的過程而發展產生的。參考張茂桂，1999: 72。
- (11) 參考江宜樺，1998a: 3。
- (12) 參考Hall, 1996; Anderson, 1991: 42-46。
- (13) 這個分類系統是參考自江宜樺《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1998a: 8-12）。原本江宜樺將認同的定義分為三種，除這裡所指的二種之外，他還提出另一種認同的定義，即是「同一、等同」（oneness、sameness）的意思，指某種事物與另一時地之另一事物為相同事物的現象。由於這種定義在西方哲學問題討論時，較常使用，中文的日常用法中，我們較少以「認同」指涉「同一」，而我也未在中文研究論述中看到採用此種定義的認同研究，因此將此種認同定義分類捨去。
- (14) 蔡琰與周倩漪的文章，均出自《新聞學研究》，56: 85-105，1998年7月。
- (15) 朱全斌與林福岳的文章，均出自《新聞學研究》，56期，「傳播與認同」專題，pp.35-64; pp.155-174，1998年1月。
- (16) 參考石之瑜，1995: 35-36。
- (17) 參考自Eriksen, 1993: 18-35。
- (18) 參考自Lentricchia & McLaughlin, 1994: 395-421。
- (19) 參考石之瑜，1993: 5；林福岳，1998: 162。
- (20) 參考Woodward, 1997: 11-13。
- (21) 關於族群認同、文化認同與政治認同的討論，參考江宜樺，1997、1998。
- (22) 參考Anderson, 1991: 6-12；李丁讚、陳兆勇，1998: 10。
- (23) 參考自Lentricchia & McLaughlin, 1994: 395-421。
- (24) 維根斯坦曾經以數作為例子，說明範疇的界限擴張。在歷史上，數首先被當作整數，後來被相繼擴展為有理數、實數、複數、超窮數以及數學家們發明的各式各樣的數的類型，人們出於某種目的可以將數的範疇僅限於整數，或有理數，或實

數，但是數的範疇並沒有以任何自然的方式得以限制，相反地，它能夠根據人們之目的被限制或被擴張。參考Lakoff, 1994: 17。

- (25) 早期亞里斯多德年代，將隱喻窄化為語言的裝飾品，不是必要的，有固然很好，沒有也沒有什麼關係，隱喻只是語言的一種異常表現；十六世紀時，更是將隱喻視為是破壞思考與知識的過程，是欺瞞他人的語言濫用。因此，在這種思考下，哲學家們經常對於隱喻的使用提出警告，亞里斯多德即提出使用隱喻的規則：不應該太荒謬、太富麗堂皇、或者是太煽情；西塞羅（Cicero）也提出，隱喻必須與它所要描述的東西有某些共通點，應當清楚地闡釋意義而非讓人產生困惑。參考自Foss, 1989: 187-194。
- (26) 語藝學者I. A. Richard、Ernesto Grassi、Sonja K. Foss均對隱喻有深度討論，可參考Foss, 1989: 187-194; Foss et.al, 1991: 41-43, 154-156。
- (27) 參考Lakoff and Johnson, 1980: 10-13；王昭敏，1996: 10-13。
- (28) 指核子戰爭爆發後，地球上空氣中煙塵瀰漫、遮蔽天日、天寒地凍，一切生物終將毀滅。
- (29) 參考Ivie, 1987: 165-182。
- (30) 參考Perry, 1983: 229-235。
- (31) 同上。
- (32) 這四點隱喻功能的歸納，參考自Hart, 1990: 218-219。
- (33) 參考朱全斌，1998: 40。
- (34) 參考Ivie, 1987: 165-187。
- (35) 參考Foss, 1989: 191-194。
- (36) 參考Hart, 1990: 218-219。
- (37) Eriksen提出族群刻板印象時說到，人們在首度見面時，會先根據彼此所屬的族群團體而決定相對態度，對於那些團體友善、對於哪些團體敵對等，也就是說，假如人們知道彼此的族群認同時，他就可以知道應當採取的應對態度。參考Eriksen, 1993: 18-35。
- (38) 對於範疇的討論，參考Lakeoff, 1994: 5-14。
- (39) 在這邊所謂的「鏡子」，並不是指傳播理論中將語言視為反映真實的「鏡子論」，而是偏向拉康「鏡像階段」的說法，人們只能看到自己的手、腳等殘缺的身體，完整的身體概念須要藉由「鏡子」——語言的反射才可得知。
- (40) 「上青」是台灣話（閩南語）說法，「上」指最佳、上等的意思，「青」則有

「新鮮」之意。

- (41) 伍佰為台灣著名的搖滾樂歌手，以本土、草根味著稱。
- (42) 「阿凸仔」是台灣話中，以鼻子高聳的特徵來指稱外國人，略帶戲謔的用法。這種以部份特徵來指稱整體的做法，即是語言機制的轉喻運作。
- (43) 「阿共仔」亦台灣話中，用大陸的共產黨員來指稱中國大陸的人民。
- (44) Borman (1972) 根據Robert Bales提出團體幻想或事件戲劇化的過程是小團體溝通類型之說法，提出符號輻合理論與幻想主題分析，他認為此類傳播不只發生在小團體，亦會發生在社會運動、政治宣傳、組織溝通。Borman的符號輻合理論是基於二個預設。第一，傳播創造真實，人們創造語言符號來解釋世界的事務與知識，我們所使用的語言符號與我們經歷的真實、具有的知識，具有密切的關係。第二，符號不只是為個人創造真實，個人對於符號的意義也會對於參與者提供一個分享的意義。

參考書目

- 中研院近史所 (1994)：《「認同與國家：近代中西歷史的比較」論文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
- 方念萱 (1989)：《方言族群認同與收看方言節目之關連性研究—以閩南語語族為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明珂 (1997)：《華夏邊緣：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台北：允晨文化。
- 王昭敏 (1996)：《閱聽人對電視廣告隱喻理解之研究》。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王振寰 (1996)：《誰統治台灣？：轉型中的國家機器與權力結構》。台北：巨流。
- 台灣社會研究編輯委員會 (1995)：〈由新國家到新社會—兼論基進的台灣社會研究〉，《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0: 1-15。
- 石之瑜 (1993)：〈論當代政治心理學思潮中的認同問題〉，《中山學術論叢》，11: 91-110。
- 石之瑜 (1995)：《後現代的國家認同》。台北：世界。
- 朱全斌 (1998)：〈由年齡、族群等變項看台灣民眾的國家及文化認同〉，《新聞學研究》，56: 35-64。
- 江宜樺 (1997)：〈自由民主體制下的國家認同〉，《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5: 83

-121。

- (1998a) : 《自由主義、民族主義與國家認同》。台北：揚智。
- (1998b) : 〈當前台灣國家認同論述之反省〉，《台灣社會研究季刊》，29: 163-229。
- 吳乃德 (1996) : 〈自由主義和族群認同：搜尋台灣民族主義的意識形態〉，《台灣政治學刊》，1: 5-38。
- 李丁讚、陳兆勇 (1998) : 〈衛星電視與國族想像：以衛視中文台的日劇為觀察對象〉，《新聞學研究》，56: 9-34。
- 李筱峰 (1995) : 《台灣，我的選擇！：國家認同的轉折》。台北：玉山。
- 杜聲鋒 (1988) : 《拉康結構主義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
- 周倩漪 (1998) : 〈從王菲到菲迷—流行音樂偶像崇拜中的性別主體搏成〉，《新聞學研究》，56: 105-134。
- 林福岳 (1998) : 〈社區媒介定位的再思考：從社區媒介的社區認同功能論談起〉，《新聞學研究》，56: 155-174。
- 邱貴芬 (1996) : 〈歷史記憶的重組和國家敘述的建構：試探《新興民族》、《迷園》、及《暗巷迷夜》的記憶認同政治〉，《中外文學》，25(5): 6-27。
- 徐火炎 (1996.7) : 〈台灣選民的國家認同與黨派投票行為：1991年至1993年間的實證研究結果〉，《台灣政治學刊》，1: 85-126。
- 翁秀琪 (1998) : 〈批判語言學、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新聞學研究》，57: 97-126。
- 張京媛 (1995) : 《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
- 張茂桂 (1999) : 〈「新台灣人」之非論〉，《當代》，137: 66-77。
- 張茂桂等 (1993) : 《族群關係與國家認同》。台北：業強。
- 梁濃剛 (1992) : 《回歸佛洛伊德—拉康的精神分析學》。台北：遠流。
- 郭良文 (1998) : 〈台灣近年來廣告中認同之建構—解析商品化社會的認同意涵〉，《新聞學研究》，57: 127-158。
- 郭洪紀 (1997) : 《文化民族主義》。台北：揚智。
- 游盈隆 (1996.7) : 〈台灣族群認同的政治心理分析〉，《台灣政治學刊》，1: 41-83。
- 黃國昌 (1992) : 《『中國意識』與『台灣意識』》。台北：五南。
- 葉月瑜 (1999) : 〈影像外的敘事策略：校園民歌與政宣電影〉，《新聞學研究》，

59: 41-66。

- 蔣慧仙 (1993) : 《台灣電影、國族敘事與性別政治—〈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輔仁大學大眾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
- 蔡琰 (1998) : 〈消音的傳奇—電視古裝劇價值認同的啓示〉, 《新聞學研究》, 56: 85-104。
- 鄭凱中 (1996) : 《「台生」外省人的國家認同與族群想像：以新黨支持者和「外獨會」為參考團體》。東吳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戴寶村 (1993) : 〈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 收錄於《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財團法人現代學術研究基金會。
- Anderson, B. (1991).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Ausmus, W. A. (1998). 'Pragmatic use of metaphor models and metaphor in the nuclear winter scenario.'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65: 67-82.
- Ceralo, K. A. (1997). 'Identity construction: new issues, new direc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385-409.
- Eriksen, T. H. (1993). *Ethnicity and Nationalism*. London: Pluto Press.
- Foss, S. K. et. al (1991). *Contemporary Perspectives on Rhetoric*. Illinois: Waveland.
- Giddens, A. (1991). *Modernity and Self - Identity: Self and Society in the Late Modern Ag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Hall, S. (1996). 'Introduction: who need "identity",' in S. Hall and Paul du Gay (Eds.) *Question of Identity*. London: Sage.
- Hall, S. (1992). '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 In S. Hall, D. Held & T. McGrew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 London: Polity.
- Hart, R. P. (1990). *Modern Rhetorical Criticism*. Texas: Harper Collins.
- Hobsbawm, E. J. (1997). 《民族與民族主義》, 李金梅譯。台北：麥田。
- Ivie, R. L. (1987). 'Metaphor and the rhetorical invention of Cold War "Idealist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4 (spring): 165-182.
- Lakeoff, G. (1994). 《女人、火與危險事物：範疇所揭示的心智的奧祕》。梁玉玲等譯, 台北：桂冠。
- Lakoff, G. &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 London: the Univ. of Chicago Press.

Lentricchia, F. & Mclaughlin, T. (1994). 《文學批評術語》，張京媛等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

O'sullivan T. et. al (1994). *Key Concepts in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Perry, S. (1983). 'Rhetorical functions of the infestation metaphor in Hitler's rhetoric.' *Central States Speech Journal*, 34 (winter): 229-235.

Rybacki, K. and Rybacki, D. (1991). *Communication Criticism: Approaches and Genres*. Belmont: Wadsworth.

Smith, A. D. (1991). *National Identity*. Reno, Nevada: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Woodward, K. (1997). 'Concepts of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in K. Woodward (Ed.)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London: Sage.

When "identity" meets "metaphor": the exercise of metaphor in molding identity

Yu-Pei Chang *

ABSTRACT

Recently many studies explor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dentity and linguistic mechanism. They handled identities as constituted within representation, the symbolic entity through linguistic exchange and social performances. This article tried to research 'metaphor', one and if not the most important mechanism of language in molding identity.

There are two major points in this study: (1) The vehicles of metaphor "chain out" when molding identity. Then these metaphors would create a different symbolic reality; (2) metaphor is the simplest way that doesn't need any rationale to let us sort out the former images, especially those preferred images in interpreting new, unfamiliar and sometimes strange experiences. Moreover, the narrative of narrative of texts and culture cultivation of audiences will mold identities with metaphors together. Those are issues worthy of further observation and discussion.

Keywords: identity, metaphor, linguistic mechanism, symbolic systems

* Yu-Pei Cheng is working on her Ph.D. at the Department of Journalism, National Chen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